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 战后世界秩序的建立、维护与改革

梁 军 刘晓莉 朱大伟 张士伟 岳 山

摘要：1945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之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年。在这场规模宏大且异常惨烈的战争中，爱好和平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法西斯轴心国展开了殊死的较量，以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世界和平与人类尊严，取得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自由战胜奴役的伟大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秩序进入了重构阶段，代表和平、发展、团结、合作的力量主导了战后秩序的重建。今天，我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就是要温故知新，凝聚各方力量，共同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关键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国际秩序重构；共同发展；新型国际关系

收稿日期：2025—04—21

作者简介：梁军（1973—），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史、英美外交史；刘晓莉（1976—），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史、二战史、国际组织；朱大伟（1981—），赣南师范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东南亚历史；张士伟（1982—），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二战及国际关系史；岳山（1974—），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办公室主任、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战与战后世界和平：反思历史与制度创新

梁 军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一场规模宏大、破坏惨烈的全球性冲突，战火席卷了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与伤痛。这场战争的影响力远超军事范畴，直接形塑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深刻改变了世界面貌。不过也要看到，在这场浩劫之后，世界和平的理念愈发深入人心，各国为构建和平秩序进行了大量努力与探索，战后国际秩序的制度化建设、冷战对峙的和平逻辑、对全球治理的革新，以及核威慑与法律机制对战争约束的辩证作用，均揭示出二战对世界和平的多维度塑造。这段历程充满了曲折、反思与希望，值得我们深入考察。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非偶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根源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存在重大缺陷：它维护战胜国的排他性既得利益及其对战败国的苛刻处理（尤其是领土割让与巨额赔款），对苏联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敌视，不但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世界主要力量间的矛盾与利益冲突，反而播下仇恨与不满的种子，导致国际权力结构的严重失衡。此后，20 世纪 30 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使各国经济陷入衰退，大量民众失业，民生困苦，社会矛盾激化。在这种背景下，极端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滋生蔓延，利用大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煽动了仇外和军事扩张的狂热情绪。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催生了国际关系的重组，日本对“大东亚共荣圈”的追求，德国的“生存空间”理论，以及苏联在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努力受挫后建立缓冲地带的战略诉求，共同加剧了地区冲突的全球化。与此同时，英美等战胜国在维持现状与避战思想指导下推行绥靖政策，试图通过牺牲弱小国家和自身的次要利益来满足法西斯

国家的要求，以换取欧亚大陆的“和平”。这种政策的短视之处在于，它不仅未能阻止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扩张野心，反而助长了后者的侵略气焰，使其在建立暴政后一步步吞并周边国家，最终将世界推向战争的深渊。

二战硝烟在全球弥漫开来，其惨烈程度超乎想象。由于闪电战战术与战略轰炸技术的应用，战争破坏力呈几何级数增长。据统计，二战直接死亡人数超过 7000 万，其中平民伤亡占比首次超过军人。^① 这场“总体战”导致无数城市和乡村被夷为平地，基础设施毁于一旦，众多家庭支离破碎，数以万计的儿童成为孤儿，流离失所，在饥饿、疾病与恐惧中挣扎求生。战争不仅造成了人员的大量伤亡，还对人类文化遗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无数的古老建筑、艺术珍品在战火中化为灰烬，人类文明的瑰宝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尽管如此，二战也催生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大同盟。面对法西斯的疯狂侵略，各国人民逐渐意识到，只有团结一心，共同抵抗，才有可能赢得和平。在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与德军进行殊死搏斗，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太平洋与非洲、西欧战场，英美盟军与法西斯军队展开激烈争夺，逐步削弱法西斯轴心国的军事力量。在东亚，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更是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国人民经过 14 年的浴血奋战，牵制了日本陆军的主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组成的反法西斯大同盟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才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德意日法西斯妄图统治世界的美梦。

二、战后反思与制度建设

二战造成的巨大破坏是文明反思与演进的催化剂。二战时召开的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播撒下制度创新的种子。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确立了多边经济框架，并以开放化、

^① 联合国：《缅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死难者的悼念与和解的时刻 | 5 月 8 日 -9 日》，<https://www.un.org/zh/observances/second-world-war-remembrance-days>。

规则化的贸易体系替代殖民时代的掠夺性贸易体系。这些制度设计体现了“通过构建相互依赖关系防止冲突”的理性主义逻辑，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各国奉行以邻为壑政策的可能性，使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和平的压舱石。

战争还带来了国际社会对集体安全的制度性探索。国联的失败让战后世界秩序设计者认识到，缺乏强制力的国际组织难以遏制侵略。在各国的努力下，1945 年联合国的成立，标志着集体安全机制取代了传统均势政治，《联合国宪章》确立了“集体安全”“大国一致”等原则，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机制在客观上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爆发。联合国体系下的国际法院、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构建了覆盖安全、发展、文化的多边合作框架，使全球治理从权力博弈走向制度建构。

国际社会吸取战争的教训，推动了国际法体系在二战后实现质的飞跃。纽伦堡审判首次确立了“反人类罪”的法律概念，将个人对战争罪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化，打破了“国家主权绝对论”的传统窠臼。东京审判彰显了司法程序对多元价值的包容，确立了侵略战争的非法性原则。这些司法实践为战后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奠定了法理基础，标志着人类从“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向“规则至上”的文明秩序转型。这些重要的制度遗产至今仍在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中延续，成为制约战争暴行的重要屏障。

战争也迫使人类重新审视工业化——现代性发展路径。关于战争创伤的记忆不仅催生了《安妮日记》《四世同堂》等反思性文本，更在制度层面推动了对战争根源的系统性反思，其重要外在表现之一是纪念仪式的象征功能在当代持续演化：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不朽军团”游行队伍，将个体记忆升华为国家叙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12 秒水滴”装置，则用科技手段具象化历史伤痛。法德以及中日韩合编历史教科书的尝试，在很大程度上将国家间的争议转化为欧洲与东亚各国实现和解的黏合剂。这些实践表明：和平不仅是权力平衡的结果，更是认知重构的产物。

三、冷战时期和平体系的制度创新与矛盾张力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胜利，它为战后世界

和平的重建奠定了基础。然而，战后不久，国际关系却陷入了美苏两极对峙的局面。美国凭借其在战争中迅速膨胀起来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妄图称霸全球，推行霸权主义政策。苏联则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致力于扩大自身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建立社会主义阵营。这种两极对峙局面导致了国际局势的紧张与不稳定，局部冲突不断，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

尽管如此，也要看到冷战时期的两极均势虽充满危险，却在客观上避免了大国的直接冲突。尽管北约与华约的军事同盟化，将欧洲分裂为“铁幕”对抗，加剧了国际关系的紧张气氛，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局部冲突成为美苏斗争的延伸，但双方仍能保持克制，将武装冲突控制在有限战争水平，并通过“热线”机制与外交谈判避免了美苏间的直接军事碰撞。

1946 年，伯纳德·布罗迪在《绝对武器》中提出的“相互确保摧毁”理论标志着核武器从实战工具转为威慑符号。截至 20 世纪 80 年代，美苏核弹头总数超 6 万枚，足以毁灭地球数十次。在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与赫鲁晓夫通过“热线”沟通的 13 天，戏剧性地验证了核威慑的双重性：既制造终极恐惧，又迫使对手保持理性克制。核武器“确保相互摧毁”的恐怖前景最终迫使美苏通过代理人战争、军备控制谈判（如 SALT 条约）维持战略稳定，这种“以暴制暴”的做法虽无法阻止代理人冲突与恐怖主义扩散，但客观上有利于遏制世界大战以及推动大国对“共存”观念的认同。

冷战背景下军控体系的演进呈现螺旋上升特征。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社会逐渐构建起核秩序的“三层防护网”。美苏在 20 世纪 80 年代签署《中导条约》等案例表明，“安全不可分割”，具有约束性、清晰性、全面性、对等性的特征，为东西方管控军备竞赛提供了对话平台与行为准则，起到了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作用；安全承诺与经济补偿相结合的核不扩散机制具有现实可行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全球核弹头数量从 1986 年巅峰期的 7 万多枚降至当前的 1.2 万余枚^①，从而印证了冷战时代建立的军控机制的有效性。

危机管控机制在实战中不断升级。1983 年苏联预警系统误判引发

^① 马子倩、陈小茹：《全球核风险多点上升中国呼吁“核冷静”》，《中国青年报》，2024 年 10 月 18 日，第 6 版。

的“彼得罗夫时刻”，催生了美苏建立核风险控制中心的协议。此后，美苏将卫星监控与智能预警技术结合在一起，将危机反应时间从分钟级压缩至秒级，这种技术进步虽然降低了误判风险，但带来了伦理困境——科技进步导致人类在关键决策环节被边缘化，一旦算法出现误判或数据被污染，便可能引发不可逆的战争灾难。这一切都表明，在技术效率与人类控制权之间取得平衡已成为维护和平的新挑战。

四、冷战后国际社会维护和平的努力与挑战

冷战后，国际社会并没有放弃对维护和平的进一步探索与追求。在联合国框架内，各国通过对话与协商，努力寻求解决国际争端的途径和方法。联合国成立之初的宗旨就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等。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在调解地区冲突、开展人道主义救援、推动裁军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维和部队多次被派往冲突地区，监督执行停火协议，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在发生自然灾害时，联合国协调各方资源，向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物资和技术支持，帮助受灾人民渡过难关。21 世纪以来，联合国维和行动还从传统停火监督转向更为复杂的任务——如东帝汶恢复独立、刚果（金）重建——体现了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的理念升级。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世界和平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贸易往来、投资合作、技术交流等活动将各国经济命运紧密相连。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国发动战争都将对其自身的经济利益造成巨大冲击，因为战争会破坏稳定的贸易环境、投资氛围和经济秩序。所以，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各国都倾向于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与分歧，避免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现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如欧盟、东盟等）的成功实践案例表明，超越主权的集体认同完全可能成为和平的新基石。

此外，民间和平力量也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种国际和平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通过宣传教育、组织集会活动、开展跨国交流合作等方式，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重视和平、摒弃战争。普通民众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和平运动中来，他们以自己

的行动表达对和平的向往与追求，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促使各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更加谨慎和克制。

尽管如此，和平的脆弱性从未消失。全球化使非传统安全威胁在 21 世纪上升为主要挑战，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战争造成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乌克兰危机打破了欧洲安全框架，巴以冲突周期性爆发，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关税政策瓦解了世界多边贸易体系，都暴露出国际机制在国际政治实践面前的软弱无力，同时凸显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紧迫性。与此同时，经济保护主义回潮、民粹主义兴起、宗教与民族冲突再起、电子与网络技术武器化等新趋势，对和平秩序构成严重挑战。如何转换维护和平的范式，在权力竞争与规则坚守、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当代维护世界和平的核心课题。

在二战胜利 80 周年之际，人类又站在世界历史的十字路口。战后建立的和平体系正面临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不应止步于缅怀先烈，更要继承其精神遗产——对人类尊严的捍卫、对集体安全的信念、对多边主义的坚持。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那样，“和平与发展是我们共同的事业。”^①当我们重新审视纽伦堡审判庭上镌刻的“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当我们在奥斯维辛废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聆听幸存者的证言，这些历史场景提醒我们：和平不是强权的恩赐，而是文明的共同选择。

在反思二战与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过程中，我们深刻意识到和平的珍贵与脆弱。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痛是无法弥补的，它不仅摧毁了物质财富，更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维护世界和平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摒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通过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方式来解决国际问题。只有在持久和平的国际环境中，人类社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各国人民才能真正共享繁荣与进步的成果。展望未来，唯有将二战的创伤转化为文明进步的动力，将历史教训内化为制度创新的基因，人类才能真正走向永久和平。在毁灭中重建的勇气，在分歧中合作的智慧，以及对人类共同命运的终极关怀，这些或许就是反法西斯战争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

^① 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5 页。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合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刘晓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传统的以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格局完全被战火所摧毁，取而代之的是由美、苏、英、中、法五大国为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即以联合国为基础所建立的雅尔塔体系。作为雅尔塔体系的基石，联合国的建立是对人类历史发展全球化趋势做出的积极回应，是随着全球意识逐渐增强而对传统国际关系原则做出的重大改变。联合国赋予所有成员国以平等的身份和地位，构建起集体安全体系维护世界和平，并且组建经社理事會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人类历史发展进入了 21 世纪，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相互依存，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然形成。如何应对国际关系的新发展形势，2012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明确提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① 2015 年，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② 于是，以联合国为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合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之间存在本质联系和密切关联，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必定要追根溯源至二战以及联合国的成立。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18 日，第 1 版。

^②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4 页。

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联合国的成立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直接孕育并推动了联合国的成立，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产物。

（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决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二战期间，反法西斯大国创建联合国的目的与一战期间协约国创立国际联盟有某些相似之处，即维护战后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发生。鉴于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灾难，人们在大劫之后犹有余悸，因此希望在集体安全的框架下建立一个范围广泛的国际组织，以此维系世界和平，防止或迟滞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但是，与一战后建立的更加注重保持战胜成果的国际联盟不同，联合国旨在规划未来世界和平。曾长期在国联秘书处担任高级职务的英国学者华尔脱斯认为，“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莫斯科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敦巴顿会议和旧金山会议属于联合国的记录，而不属于国联的记录。负这些事业责任的人喜欢不把它们看作是恢复过去，而看作是计划未来。”^①

联合国的宗旨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所决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具有世界规模的反法西斯战争，反法西斯国家通过缔结条约结成反法西斯联盟，相互支持、配合和援助，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1941年8月，美英签署《大西洋宪章》，宣称待纳粹暴政被最后毁灭后，希望世界终将能建立一个“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②。这是关于战后国际组织的最初的构想，它所确立的原则成为《联合国宪章》的基础。1942年元旦，反法西斯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宣言以《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为盟国的共同纲领，约定决不单独停战或单独媾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建立，“联合国家”首次出现在正式文件中。1943年10月，随着战争局势的根本性战略转折，为了将战时盟国间的合作延续至战后，通过集体安全机制维护和平，

^① 华尔脱斯著，封振声译：《国际联盟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4—76页。

^② 丘吉尔著，吴万沈等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3卷），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382页。

并避免重蹈国际联盟的覆辙，美、苏、英、中四国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决定在战争结束之前成立一个新的国际和平组织，同时四大国作为发起国承担起筹备和组建联合国的重任。

随着二战局势的逐渐明朗，胜利已指日可待，联合国发起国召开多次会议，就联合国的组建进行充分讨论和商议。历经1943年底开罗会议、1944年初德黑兰会议、1944年8月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联合国发起国协调了彼此间的诸多矛盾和分歧，最终就联合国的机构设置、职能分配和运作机制达成共识。1945年4月，联合国发起国召集所有反法西斯盟国举行联合国制宪会议——旧金山会议，在初步形成的《联合国宪章》草案的基础上，经过所有盟国的讨论最后通过了《联合国宪章》。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宣告成立。作为反法西斯联盟的延续、集体安全机制的载体、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组织，联合国的性质和宗旨是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基础和核心。

（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联合国的成立奠定了舆论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时间之久、涉及范围之广、伤亡人数之众、影响程度之深空前绝后，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各国生命财产损失难以数计。战争在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强化了各国民众追求和平的愿望，冲击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潮得到推崇。

即使在孤立主义传统浓厚的美国，二战也深刻影响了民众和领袖的思想和理念。战争初期，在孤立主义思想的惯性控制下，美国希望能够置身于欧洲战争之外，然而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恶化，美国公众的态度和情绪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意识到在世界大战来临时，美国将无法独善其身。“战争的开始意味着美国人无可选择地最终被从习惯的安全中拉了出来，他们的国内生活曾经只被外国世界的危机扰乱过，现在他们被迫进入了一种国内生活主要决定于外交政策和国防需要的情景中。”^①直至美国本土遇袭，国际主义取代孤立主义成为美国的主流思潮，奉行“威尔逊主义”的罗斯福和赫尔决定参战，并牵头组

^①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著，俞敏洪等译：《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页。

建反法西斯联盟，合作御敌。“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震惊使民众脑海中剩余的孤立主义情绪也荡然无存了，为美国人再次进行一场使世界事务成为国内信念之延展的征战开辟了道路。”^①

作为反法西斯联盟的重要一员，中国同样意识到，无论是战时获得战争胜利，或是战后维护世界和平，都需要所有盟国密切合作方能实现。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宣言——为抗战五周年纪念》中指出：“去年八月大西洋宪章的宣布，今年一月二十六国的宣言，最近英苏同盟的签约以及苏美协定的签订，都规定了战后世界是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的世界。不扩张领土，不干涉别国内政，各国人民有选择政治制度的自由，不让法西斯有抬头的可能，凡此一切，都被中苏英美及一切反侵略国所共同承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我们拥护这些宣言，我们愿意本着这些宣言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各爱国党派协同一致，参加战后新世界与战后新中国的建设。”^② 1945 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胶园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全球规模的反法西斯战争，反法西斯联盟是对既往单兵作战和军事集团等立足于狭隘民族观念的战争方式的重大革新，其思想和舆论基础便是全球意识不断发展形成的国际主义思潮。联盟内部，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或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大国，都表现出对于组建超国家国际组织的热情和期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培育了通过国家间联合以及集体安全体制的建立，为战后世界进行规划和设计的国际组织思想，从而为联合国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和舆论基础。

（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联合国的成立奠定了现实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

① Robert Dallek, *The American Style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32.

② 《中共中央宣言——为抗战五周年纪念》，《新华日报》，1942 年 7 月 7 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85 页。

要因素，同时也为联合国的成立奠定了现实基础。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覆盖所有反法西斯盟国，并且给予所有成员国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力。联合国的权力重心安理会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尽管五大国国家实力不同，却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鉴于他们对于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贡献以及对战后世界和平发展的影响而确立大国身份和地位，具有毋庸置疑的代表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苏、英三大国对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美国的实力，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在大国中首屈一指，作为反法西斯联盟的发起国和组建者，它不仅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取得了军事胜利，同时也对盟国“先欧后亚”大战略的制定以及反法西斯联盟的支持和维护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在联合国的酝酿、筹备和创建过程中，美国发挥了核心作用。苏联是战胜法西斯德国的主要力量，德军在苏德战场损失了 1000 万人，占它在二战期间总伤亡人数的 73%，同时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展现出的英勇顽强的精神面貌，也为苏联赢得了盟国的认同和尊重；英国拥有庞大的殖民地和英联邦，在法西斯德国挥师西进不断创造战无不胜的神话时，在法国败降、英法联军遭遇敦刻尔克大撤退时，在遭遇轰炸权衡或战或降的至暗时刻，英国阻止了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步伐，英国无论从军事还是从政治层面都是二战期间的重要国家。

中国和法国对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贡献最终也得到应有的承认：中国战场是反法西斯战争爆发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的重要战场，不仅遏制了德日意法西斯的勾结和战争规模的扩大，而且有力地支援了盟国“先欧后亚”战略，在抗击和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更是发挥了不容抹杀的作用。在日本总军事力量中，陆军无疑占有主导地位，而日本陆军主力始终被困在中国战场，空军 1/3 参与对中国作战，因此中国抗战是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核心力量，是取得对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力量。中国的全民持久抗战，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于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也提供了重要经验。中国的抗战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并且通过《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并最终成为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由此获得了国际地位的提升。法国的大国地位同样基于对于二战及战后世界规划的重要贡献。法国虽然败降，建立了维希政府，但是戴高乐领导下的自由法国积极参加了在非洲、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军事行

动，并且通过1943年成立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逐步获得国际社会承认，1944年光复法国后成为法国临时政府。作为传统欧洲大国，法国也将在战后管制德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丘吉尔的鼎力支持下，法国最终也获得了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身份。

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同盟中的五大国虽然在战后规划上有种种分歧，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深信战后国际新秩序有赖于大国的继续合作，大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可以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战后的国际组织必须由大国来主导。因此，在联合国创建过程中，大国对于否决权的规定以及大国一致原则的坚持是联合国得以保持活力和提高效率的关键。可以说，“大国一致原则”和否决权的规定是联合国的灵魂，而这一规定则是源于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确立的大国的意愿。

二、联合国与战后世界

联合国的建立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战后雅尔塔体系的基石和支柱，联合国的成立对战后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维护战后世界和平与安全

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并为此制定了严密而周详的规定。联合国宪章第一条规定，“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为联合国的第一宗旨。联合国宪章的第五章“安全理事会”，第六章“争端之和平解决”，第七章“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对办法”，则具体规定了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机构、手段、方法和程序。宪章不但要求会员国放弃诉诸战争和次于战争的武力措施的权利，而且也放弃以战争相威胁和以次于战争的行为相威胁的权利。^①同时，安理会拥有的处理安全事务的权力因常任理事国所享有的否决权而使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

^① 劳特派特著，王铁崖、陈体强译：《奥本海国际法》（下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6页。

点。在战后两极格局和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形下，联合国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即使当下国际矛盾频仍，联合国依然是维系世界和平的重器。

（二）促进和保障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联合国成立过程中，各国都意识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回顾以往的战争起因，多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危机所造成的，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与经济和社会危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于是，建立相应的机构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逐步成为各国的共识。联合国宪章第九章“国际经济及社会合作”以及第十章“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的规定，使得联合国对于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发展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和平与发展是促使人类历史发展的两个密不可分的因素，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代社会。因此，联合国在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同时，还肩负起促进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联合国仍致力于世界经济的有序发展。

（三）推动世界非殖民化进程

联合国的建立为殖民地人民打开了通往独立自主的大门，它支持和帮助殖民地国家人民获得独立，改变了全球政治局面，使广大亚非拉人民得以摆脱殖民统治和种族压迫。《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托管制度的规定有三章：第十一章“关于非自治领土之宣言”、第十二章“国际托管制度”和第十三章“托管理事会”。托管制度虽然并未彻底取代殖民体系，但是联合国对于托管制度以及托管理事会的设立，对殖民体系构成了巨大冲击，发挥了旗帜和导向的作用。联合国前官员布赖恩·厄克特认为，“《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殖民地人民以及托管制度的三章规定，为世界非殖民化进程提供了动力和合法性，使得非殖民化在旧金山会议后短短三十年就得以完成，从而结束了漫长的殖民历史，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地理地图以及联合国成员国的状况。”^①大批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发展中国家终于崛起，并以独立的姿态和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① Brian Urquhart and Ralph Bunche,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W.W. Norton, 1993, p.122.

（四）尊重人权和自决原则

鉴于两次世界大战对各卷入国人民基本人权的大规模侵犯，早在 1941 年的《大西洋宪章》和 1942 年的《联合国家宣言》中，盟国便将尊重人权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目的，“为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并为保全他们本国和其他国家中的人权和正义起见，完全战胜敌国，非常重要。”^①联合国的成立更是将尊重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男女平等写进了联合国宪章，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给人权下了权威的定义，把促进人权的国际合作纳入联合国的活动范围。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一条规定：“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第二条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联合国在人权保障问题上的工作在当下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联合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联合国为基石的雅尔塔体系经过冷战时期的锤炼，已经延续了战后世界 80 年的基本和平，并从诸多方面促进了战后世界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以大国合作为基础的联合国依然在后冷战时代以及 21 世纪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是当今国际关系的晴雨表，是国际共同体的象征，同时也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织保证。

（一）联合国与国际共同体的形成

联合国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是国际社会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全球意识的增强，通过组建国际组织的方式应对各成员国面临的共同挑战。相对于以往以维护主权国家利益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国际社会，联合国更强调国际共同体的利益，以及对人类共同福祉的维护。“在

^① 李铁城：《联合国的历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9 页。

有些时候，国际共同体和联合国这两个名词可以互换使用。”^① 联合国不仅仅关注和平和安全等重大国际关系问题，同时也体现了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视。无论是对成员国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还是对非殖民化进程的推动，或是对人权问题的关注和介入，已经超出了单纯衡量国际利益得失的考量范式，体现其对人类整体利益和共同福祉的维护。

早在 19 世纪末，随着人类历史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单靠一国所不能解决的国际事务不断增多，于是国际组织应运而生，逐步形成了分布于各行各业的行政事务性国际组织，例如万国邮政联盟、万国电报联盟、国际河川委员会、国际度量衡联盟等。通过国际组织，国家之间达成了合作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国家之间的合作进入政治和安全的核心事务层面，并促成了第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的诞生。国际联盟的核心宗旨虽然是维护战后世界和平和安全，但是国联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也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例如，对于难民安置、医疗救助、住房改善、营养标准制定、知识分子保护、劳工权益保障等方面，国联表现出对于人类以及人本身权益的重视。

作为国际联盟的继任者，联合国在保障人权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贡献更为突出。联合国内部的经社理事会和人权理事会，以及专门机构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粮农组织、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保护妇女儿童组织等，对于科学文化发展、疾病检测救治、劳工权益保障、难民安置保障，以及特定弱势群体的保护等方面提供了全面的保障。这些作用远远超出了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范畴。因此，联合国也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机构和组织保障。

（二）联合国、国际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的数量激增，出现了“超国家主义”的发展趋势，国际共同体的概念逐渐取代了传统国际社会的概念。相较于后者，前者关注的是超越单一主权国家利益的更为广

^① Bruno Simma and Andreas L. Paulu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9, No. 2, 1998, p.274.

泛的共同利益。因此,“共同体一词更能够体现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这种更紧密的联合。”^①然而,国际共同体概念本身也遭到质疑,即使国家之间联系密切,仍然存在国家利益的分歧和矛盾,因此国际共同体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非现实状态。主权国家并不接纳超国家联合体,并且在外交实践中排斥国际组织的介入,强调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的行为导致国际关系紧张,对国际共同体构成巨大挑战。

“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且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是对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出的积极回应。当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国际社会的主旋律,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也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在 2015 年出席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峰会上全面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含义,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②,这些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同时也是全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联合国作为现今最重要的普遍性国际组织,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承担重要使命。2017 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讲话,进一步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和建设路径。习近平主席提出:“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③这五个方面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联合国是其中重要的组织保障和实现路径。联合国关注国际社会、国际共同体和人类共同福祉的维护,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地球是人类共同福祉,也是联合国的努力方向。

① Bruno Simma, “From Bilateralism to Community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Law”, *Recueil Des Cours*, Vol.250, No.VI, 1994, p.345.

②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3—254 页。

③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18—421 页。

（三）中国、联合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人类发展提出的美好愿景，同时也是中国为全球治理提出的设想。自从 2013 年中国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经过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这一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积极回应，是建立在既有国际秩序基础上的，是对既有国际机制的完善和补充，而不是打破现有国际秩序进行革命性或颠覆性的创新。

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会尊重和借助现有国际秩序中各个领域的国际组织，尤其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普遍性国际组织。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两次公开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后，联合国也对该理念做出了积极回应和支持。2024 年 11 月 5 日，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高票通过中国、俄罗斯等国提出的“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项决议。决议呼吁各方加强和平利用外空，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在外空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连续 8 年写入联大一委决议。^①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全球化发展趋势，也是对全球治理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因此，相较于主权国家，联合国更加认同中国提出的保护人类共同价值和实现人类共同福祉的设想。

中国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此需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基石构建的国际秩序，继续发挥联合国的全球治理功能，应对全球性挑战。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中国已经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外交实践中，中国也特别提到要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中国将继续发挥在联合国中的负责任大国作用，始终与世界携手同行，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① 《联大一委呼吁在外空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4 年 11 月 7 日，第 3 版。

东南亚国家的二战记忆及其形塑机理

朱大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不到 6 个月的时间里通过军事、外交以及武力威慑的方式驱逐或胁迫原宗主国，把整个东南亚囊括进帝国的版图，东南亚国家从此在事实上几乎同步进入长达三年半之久的日据时期。然而，东南亚战场以及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记忆则长期处于国际主流学界关注之外。东南亚国家和人民的抗战努力同样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地区国家的战争经验和战争记忆不应该被忽略。

一、东南亚国家的二战记忆

经济和生活上的苦难是战争留给东南亚国家的共同记忆。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东南亚前后所宣扬的“大东亚共荣圈”神话很快破灭，各国经济被迫转向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圣战”轨道。在战时经济之下，各国普遍面临食物短缺、物价飞涨、黑市猖獗等经济失序的场景。再考虑到自然灾害的叠加，盟军轰炸带来的贸易通道的受阻，在情势特别严重的越南北部地区和印尼爪哇，各有数百万人死于大饥荒，这样的情形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可看到。

日据时期也给东南亚各国人民留下了恐怖的历史记忆。日本为了维护占领秩序，通过宪兵队进行了极为严苛残暴的统治。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很多人都经历了动辄被宪兵队抓去拷打、折磨致死的痛苦。新加坡抗日英雄蔡杨素梅在谈到战争带来的忧伤时说道，“我本人也在我丈夫被捕的两个星期后，无辜被监禁在史丹福路日本宪兵部（前 YMCA 大厦）达两百多日，期间受尽酷刑，包括灌水、电刑，殴打及至脱光上身衣服的拷问。惊悸、恐怖，身心所受的损害

和创伤，是没有经历过这场浩劫的人所不能想象得到的。”^① 蔡杨素梅的遭遇是日本占领下东南亚各国人民惨痛经历的典型代表，而恐怖的记忆还不止这些。

日本占领东南亚期间，还实施了大屠杀、强制征募劳工和慰安妇等严重侵犯人权，违反人道主义的暴行，这些暴行给东南亚各国人民留下了数不尽的血泪创伤。日军在战时东南亚实施的大屠杀中，最惨无人道的是1945年2月的新加坡检证大屠杀，制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西斯所实施的除南京大屠杀、奥斯威辛大屠杀之外的第三大战争暴行。在当时的华侨眼中，“新嘉坡检证大屠杀案，为日寇南侵暴行中最为惨无天日者，亦吾侨血泪史中最惨痛之一页也。”^② 马尼拉大屠杀也是日军在东南亚犯下的重要罪行之一。有菲律宾历史学家这样描述马尼拉居民的惨状，“马尼拉的杀戮事件有多种形式。有时会发生头部射杀或军刀斩首，有时会发生对整个家庭或人群的大屠杀，他们被关在建筑物里，用手榴弹爆炸，妇女被强奸，然后用刺刀从腹股沟割到喉咙，在炎热的阳光下流血而死。孩子们双腿被抓住，头撞在墙上。婴儿被抛到空中，用刺刀刺穿，或者用刺刀刺地面上的婴儿，然后举到空中。未出生的胎儿被日军用刺刀从孕妇身上挖出来。”^③ 印尼人在回顾战时日军暴行时也充满了悲伤的情绪，“我记得我的祖父告诉我，那是我们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在占领期间发生了大屠杀和强奸案。

本土个体或特定群体英雄主义的抵抗书写也是东南亚国家的二战记忆图景。“战争为展示那些参与战斗的人的英勇和英雄主义行为提供了机会。”^④ 考虑到抵抗外敌，为国牺牲的英雄主义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积极作用，东南亚各国也没有忽略二战时期的战争英雄塑造及其在战后政治中的运用。在新加坡，如林谋盛、阿德南、蔡杨素梅等，

① 蔡杨素梅口述，谭顺娟记录改写：《人类可耻的记忆》，冯仲汉主编：《和平的代价》，新加坡胜友书局1997年版，第259页。

② 许钰：《昭南时代检证大屠杀案始末记》，《南洋杂志》（新加坡），1947年第6期，第115页。

③ Benito J. Legarda Jr., “The Most Vicious Crime in Philippine History”, In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Remembering World War II in the Philippines Volume I: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World War II in the Philippines: Remembering 60 Years After*, 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2007, p.12.

④ Uldarico S., Baclagon, *Heroes of World War II*, Metro Manila: Agio Printing & Publishing House Makati, 1980, p.III.

以及马来西亚的阿德南^①、缅甸组织反法西斯自由联盟的昂山、菲律宾捍卫巴丹的英勇战士^②、印尼的苏普利亚迪、越南组织越盟的胡志明等个体或团体，都在相应国家的战争记忆塑造中被大书特书，成为如今东南亚国家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怀。

二、东南亚国家二战记忆中的缺失

然而，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对战时特定事件的集体失忆，也可看作是另一种记忆形式的选择性遗忘。对于那些可能造成国内分裂或不利于执政当局权威维护、巩固，不利于战后民族国家建设的战时历史经验，东南亚国家普遍地选择了失忆的态度。

具体而言，在新加坡，战时本土居民，如华侨协会的合作行为，战争后期新加坡华人与马来人的族群冲突等都被列入二战史书写的负面清单，被视为有毒的记忆。在马来西亚，战时马共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抗日功绩在官方塑造的二战集体记忆中基本被抹杀。在印度尼西亚，苏加诺与哈达战时响应日本号召，动员劳工为日本修建军事设施的行为也很少被提及。缅甸对国父昂山和巴莫的早期对日合作行为，对战时缅甸族群之间的暴力冲突均鲜有提及，甚至连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在战争后期的抵抗行为也被重构，焦点指向强调军队在国家独立斗争中的作用，而非缅甸各族人民英勇抗日的行为。在泰国，銮披汶政府与日本结盟的行为，以及占领马来四邦的行为，在官方的战争叙事中只是被轻描淡写地提及，在不多的叙事中也是突出政府被迫选择与日本结盟的一面。

需要指出的是，那些被官方刻意遗忘乃至重组的战争记忆在今天东南亚各国不时被唤起，反映了战争记忆在东南亚各国国内的多义性和竞争性特征。比如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二战记忆就与各自官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失衡、落差和错位的问题。官民之间对战争经验再现的焦点以及意义生产存在冲突乃至完全对立的现象。菲律

① 阿德南·本·赛义迪是英军马来军团的团长，在新加坡的鸦片山抵抗日本入侵的战斗中光荣牺牲，因其族裔身份是马来族，战斗牺牲地点却在新加坡，故而，战后被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双方都视为本国的战争英雄。

② 1980年菲律宾出版了一本书，对菲律宾二战抵抗英雄做了系统的梳理，参见：Uldarico S., *Baclagon, Heroes of World War II*, Metro Manila: Agio Printing & Publishing House Makati, 1980。

宾民间各种退伍老兵、慰安妇受害者团体、马尼拉大屠杀幸存者及其遗属团体等也有着与官方不尽相同的战争记忆。泰国国内战时自由泰运动拥趸者的战争记忆与泰国官方也存在截然不同的图景。在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以及各民族地方武装也同样构筑了自己的战争记忆。从这个角度上看，东南亚国家在本国内部尚未建构出各民族各党派和各阶层共享的二战记忆。

三、东南亚二战记忆形塑的影响因素

战争记忆是特定群体立足当下，借助各种场域对历史上发生的战争所进行的再现，其形塑机理非常复杂。就东南亚国家二战记忆的建构而论，不管是纪念，还是遗忘，我们都可以从历史上的战争经验、国家建设的国内政治学以及对外政策的开展这三个主要维度加以把握和理解。

首先，东南亚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的客观战争经验是其战后战争记忆形塑的根基性来源。

影响到东南亚国家战争记忆图景建构的战争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范畴。第一，该国在战争中遭受的人员伤亡和物资减损的数量与程度，尤其是有无发生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如大屠杀、虐待战俘、慰安妇、强制劳工以及大饥荒等。第二，战争在本国或本民族的发展史上是否具有重大意义，如是否推动或实现了民族的独立，是否有利于民族的团结，是否有助于提升民族的自豪感等。第三，战时经验是否有利于战后国家权力主导者政权的维护和巩固。以上三者的答案如果都是肯定的话，则这场战争注定会在国家的集体记忆中占据重要一环。如果都是否定的话，那么这场战争则会因为权力的操弄，难逃结构性遗忘或失忆的命运。

以新加坡为例，战争记忆之所以能透过各种记忆场域被建构，并在代际之间传承，源于其特殊的战时经验。一是战时遭遇的多达 5 万华人遇害的验证大屠杀，给新加坡华人社会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并不时在当下被唤起。二是战时经历推动了新加坡本土民族意识的兴起，这一点在新加坡的历史教科书中是反复被强调的主题。与新加坡相似的是，战争记忆在菲律宾的唤起与存续，更多的与战争期间的特定事件，如巴丹战斗以及菲律宾游击队的英勇抵抗、马尼拉大屠杀以

及慰安妇的悲惨遭遇等相关。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对二战的结构性的遗忘则因为很多战时的经验不利于他们的战后国家建设。马来西亚不愿正视和承认战争期间马来亚共产党在马来半岛抗日运动中的积极领导作用,因为这一点有损马来西亚历史叙事的马来人主体性。泰国官方与缅甸民族主义者在战争早期与日本的合作经历也是两国需要刻意遗忘的历史经验,毕竟与人人喊打的法西斯国家的合作不利于在国际社会树立国家的正面形象。而对于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而言,战时经验中没有太多大规模的英勇抵抗等重要的记忆事件,两国都倾向于把二战视为近代以来反殖民主义和追求民族独立这一漫长斗争的一个插曲,故而,二战在两国的历史记忆中被边缘化。

其次,战后东南亚各国的战争记忆图景的塑造与相关国家国内的政治经济学密切关联。

历史记忆不是历史的镜面反射,如果说存在光学关系,那也是棱镜的折射。历史记忆是历史的选择性的甚至有时是扭曲的反映和保存。现实中的种种需求、欲望便是过滤折射历史的棱镜,其中最有力的便是权力。记忆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政策工具,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工程。这里的国家建设对于多元民族的后殖民时代的东南亚国家而言,其内涵相对广泛,包括国家认同建构、安全建设、经济建设等。

当下新加坡的二战记忆建构有两个最重要的政治诉求:一是通过共享的战争记忆的书写,建构多元社会的新加坡国族认同;二是对新加坡沦陷的纪念服务于新加坡全面防卫这一国家安全战略的推行。战时有害于民族和睦的经验,如华人与马来人的冲突则被选择性遗忘。在马来西亚,由于马来人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战时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英雄主义则被抑制,主要原因在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马来人二战记忆中称颂的唯一抗日英雄是马来人阿德南。整体来看,马来人在抗日中的贡献乏善可陈。故而,在马来西亚官方看来,二战记忆是无用于国家建设的,甚至是有害的。尽管今日马来西亚对华人社会的二战记忆持相对宽容态度,但历史叙事的马来人中心使得华人社会的战争记忆始终难以成为主导性的国家记忆。在缅甸,官方的战争记忆构筑的核心在于掌权的军方的历史业绩与伟大,其他的则被选择性失忆。在泰国、越南和印尼,二战,要么是不合时宜的过去,如战时泰国国内抗日的自由泰运动领导人的政治理念与军方间存在着差异乃至冲突的一面,故而自由泰的抵抗记忆与

对日合作一同受到官方的抑制；要么只是本民族反殖民主义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前奏，对于本国的国家认同建构意义远不及战后伟大的反殖民主义的解放战争，如越南和印尼。故而，二战在这些国家的历史记忆中边缘化。

此外，作为国家建设一部分的经济建设也是推动东南亚相关国家战争记忆唤起、形塑的动力因素。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战场旅游观光潮的出现，“旅游业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特别是在东南亚，促进了遗址产业的发展。此外，经济增长、多样化，以及对‘过去’越来越多的政治使用一起，对该地区更复杂的战争纪念起到了推动作用。”^①以新加坡为例，在过去的一些年，新加坡建设修缮开发了大量战争遗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 50 周年的 1995 年，15 个与战争相关的遗址被命名，到 2002 年时达到 20 个。^②热门战争景观如战争纪念公园、樟宜礼拜堂与博物馆、旧福特车厂纪念馆、西乐索炮台、鸦片山岗战役纪念馆、地下指挥中心博物馆等，这些纪念空间让观光者在静谧中追忆那烽火连天的岁月。

最后，对外政策的考量也是塑造东南亚国家二战记忆的重要变量。

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议程而言，战时记忆的形塑尤其需要优先考虑的是与日本外交关系的维护问题。战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基础设施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二战中或随后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遭到重创，因而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新兴的东南亚国家建设的优先选项。日本作为亚洲经济的领头羊，它的投资和援助对东南亚国家有着重大的吸引力。在 1969 年到 2004 年间，日本共向东南亚提供了 5130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文莱 4396 万美元、柬埔寨 112335 万美元、印度尼西亚 1958505 万美元、老挝 118792 万美元、马来西亚 219296 万美元、缅甸 290467 万美元、菲律宾 1050030 万美元、新加坡 26699 万美元、泰国 846763 万美元、越南 506782 万美元、东帝汶 6297 万美元。^③2008 年，印尼众议院院长兼印尼日本友好协会会长的吉南加尔·卡尔塔萨斯米塔（Ginandjar Kartasasmita）撰文指出，“日本对印尼的官方

① Ken Lunn, “War Memorialisation and Public Heritage in Southeast Asia: Some Case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Reflec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 13, No.1, 2007, p.82.

② Joan C. Henderson, “Remembe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Singapore: Wartime Heritage as a Visitor Attraction”,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Vol. 2, No. 1, 2007, p.40.

③ “OECD Data Explorer”,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ttp://stats.oecd.org/wbos/default.aspx?DatasetCode=ODA_RECIPIENT, 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18 日。

发展援助为印尼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没有日本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就无法解释印度尼西亚今天的发展情况”^①。卡尔塔萨斯基塔的对日态度在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与中国和韩国不同的是，东南亚国家在官方层面大多小心翼翼地尽可能不去触及战时日本施加给他们的不幸过去，以免惹怒日本，进而影响到它们与日本的双边关系。每当中韩两国政府和民间对日本否认、篡改二战历史的行为，如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靖国神社问题以及劳工问题进行批判时，东南亚国家往往一片沉寂，仿佛二战完全是他人的过去，即使在新加坡、菲律宾和缅甸也是如此，呈现出集体失忆乃至抑制的状态。以菲律宾为例，2017年12月和2018年12月，菲律宾相关受害者团体曾分别在首都马尼拉树立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慰安妇受害者的“少女像”雕塑和“慰安妇”雕像，但菲律宾政府很快在日本的压力下予以拆除，反映出对外政策考量是塑造东南亚国家二战记忆的重要因素。

东南亚各国基于本国独特的战争经验和战后现实的需求与关怀，通过对战时经验选择性的纪念与遗忘，形成了各自二战记忆形塑的脉络与框架，进而构筑了具有本国历史经纬和时代特征的记忆图景。这既是东南亚各国对战后国际与地区格局变化的适应，也是各自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必然选择。

整体上看，东南亚的二战记忆处于一种被遗忘乃至被抑制的沉寂状态，东南亚地区国家普遍没有建立起有关二战的发达的文化记忆机制，还没形成一个积极的二战记忆文化。当前一些国家的二战记忆呈现出官方叙事下单向的、碎片化特征，记忆的内容与记忆的意义生产多被筛选、挪移与重构，二战记忆普遍面临着难以实现代际流转的困境。考虑到该地区各国战争经验的独特性以及各国内部不同团体竞争乃至冲突的战争叙事，如何建构本民族共享的战争记忆便成为考验相关国家执政者国家建设智慧的试金石。

^① Ginandjar Kartasasmita, Indonesia and Japan - 50 Years of Partnership, https://www.id.emb-japan.go.jp/oda/en/topics_ginanjara.htm, 访问时间：2019年8月11日。

二战期间中国社会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建

张士伟

中国参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构建，是被遗忘的二战故事。更鲜为人知的是，中国为参与战后国家经济体系的构建，综合中国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不但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还与美英进行了相关交涉，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里，中国社会各界的贡献是指学术界贡献了观点，产业界提出了需求，新闻界引导了讨论，他们共同参与并监督了中国代表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谈判，奠定了中国经济大国的地位，是百年民族复兴路上不可忽视的一环。

一、战时中国积极提出的货币合作方案

国内外学者们广泛认为，在战后经济秩序构建问题上，中国是被动响应美国，应美国的要求才加入谈判的。实际上，中国对于战后经济秩序构建早有准备。1942 年元旦《联合国家宣言》发表后，财政部立即启动了对美英战时金融合作实践的研究，并提出中国与美英在金融方面的合作设想。首先，从中国实际出发，提供军队、劳工和农矿产品协同盟国作战，而盟国要向中国提供器材，提供贷款维护法币固定汇率直至战争结束。其次，中国与美英互派经济人员，协调经济政策。再次，对于战后中国稳定金融及复兴经济等事项，应协商办法。^①与此同时，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也于 1 月底拟定《我国与同盟国经济配合问题建议大纲》，要求同盟各国共同缔结永久之货币协定，其目的：一是利用平准基金共同维持各国货币对外价值的安定；二是彻底消灭各国汇率暗盘，建议召开预备会议予以讨论。^②大纲中所列金融目标

① 节略，“蒋中正总统文物”，1942 年 1 月 4 日，中国台北“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002-080109-00001-009。

② “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呈总裁副总裁”，1942 年 1 月 31 日；“我国与同盟国经济配合问题建议大纲”，1942 年 1 月，第 11 页；“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著同盟国经济配合问题、英美贷款用途问题等金融资料及有关文书”，1942.1—1942.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396-12942。

与美国计划中稳定汇率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出时间也较为接近，显示两国有共同的需求。

至当年5月中旬，这些理念都融入外交部《战后国际经济合作之原则及办法大纲修正案》之中，在目标上，除上述以合作稳定各国币值之外，还增加了“加强经济落后之国家之经济发展”“在资金及技术上援助财政困难或经济恐慌之国家”“经济先进国家应以资金生产工具及技术，扶助经济落后国家”等内容，^①为之后中国提出本国方案做了初步的准备。从这些文献也可看到，中国提出战后国际货币合作方案的目的非常明确：稳定币值，加快重建与发展，使《联合国家宣言》中确认的中国大国地位名副其实。

中国能够快速启动战后规划，且明确目标为争取大国地位，从一开始就表达了对于民族复兴的渴望和追求。这与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的有关战后秩序的大讨论密不可分。大讨论一方面分析了中国在金融贸易领域的处境，提出相应对策；另一方面对大国地位与民族复兴充满热情。可以说，正是社会大讨论孕育并且推进了中国对于布雷顿森林谈判的参与，并将民族复兴的高度热忱融入其中。

二、关于布雷顿森林谈判的社会大讨论

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束缚下，中国本就处于国际体系的极端弱势地位，饱受西方国家的殖民与掠夺之痛。1933—193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造成了沉重打击，中国社会各界变革国际秩序的愿望更加强烈，他们展开大讨论，要求独立的货币主权，不仅在经济上达到自给自足的状态，在政治上也要实现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甚至于以大量的资源、人口与智仁勇的民族精神，担负起重建世界政治经济新体系的使命。^②而这些除了实现民族复兴和大国地位，别无其他办法。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憧憬，并没有太多能够实际发挥作用的办法，看似“空谈”。然而，就是这些“空谈”，为中国社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145页。

② 古今：《国际货币战与中国货币的前路》，《社会新闻》，1935年第3期，第131页；宋毓岷：《国际经济斗争与中国革命》，《统一评论》，1935年第3期，第5—6页；张白衣：《一九四〇年世界经济：中国将负起重建世界经济新体系的任务》，《时事月报》，1940年第6期，第92—93页。

会迅速切入有关战后国际货币计划的讨论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

1943 年 4 月初，美英两国战后国际货币计划先后公开，在中国社会引起震动。美国欲建立国际平准基金组织，实施份额制度，借此推动会员国实现货币稳定，促进国际贸易均衡增长。英国的目标与美国类似，但实施方式非常不同，他们弱化黄金的作用，强调国际贸易透支原则。对此，中国“举世治货币学者，均集中兴趣于此一课题之研讨”^①，各种建议频频出现于报纸和杂志的显著位置，有关战后经济秩序的社会大讨论达到高潮。少数人士认识较为悲观，认为“以吾国现阶段之经济状况，而醉生梦死，与经济发展之欧美诸国，妄谈经济自由，妄谈世界经济政策大同，则中国经济将永远沉沦于次殖民地经济状况之下”；^②另一些人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如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陈光甫认为，“对于战后货币政策，中国或可选择类似战前德国所实施的严格的外汇控制，或追求自由政策……后者可能更为合适。货币问题可通过不定期的政策调整来解决。”^③这基本上就是赞同美国方案，避免对它提出重大修正建议。

在当时的讨论中，这两类人的看法都没有得到广泛支持。更多的人士抱持乐观态度，支持中国主动参与战后秩序的构建，提出本国诉求，实现民族复兴的宏愿。如经济学家罗敦伟便提出，中国应当通过“经济国际”的建立，参与制定“世界和平重建的经济方案”，以安定一切战胜国家、战败国家、殖民地民生，做好财政经济的复原工作。^④更有人大胆主张，中国拥有大量的资源与劳力，在参加国际货币会议时，应提出全面经济合作的主张，运用货币制度去开发世界蕴藏的资源，供全体人类的消费，实现永久和平的愿望。^⑤显然，在这样的氛围下，中国有充分的条件迅速提出本国方案，并有更大的底气与美英交涉。

① 《战后国际通货计划特辑·导语》，《财政评论》，1943 年第 6 期。

② 钟隐：《论战后国际货币计划》，《财政评论》，1943 年第 3 期。

③ Summary of Comments 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lans, Memorandum by Mr. K.P. Chen, May 21, 1943, Box 78, Arthur N. Young Papers, Hoover Archives, CA, USA.

④ 罗敦伟：《财政复员问题试论》，《财政学报》，1943 年第 2 期。

⑤ 祝世康：《我国对于战后国际货币合作应取之态度》，《四川经济季刊》，1943 年第 1 期，第 342 页。

三、社会专业群体与中国方案的出台

在社会大讨论的基础上，在财政部、外交部等部门的协调下，各方迅速出台了针对美英方案的分析报告及对策并达成共识。时任财政部顾问的美籍专家杨格(Arthur N. Young)称，各部门“夜以继日地研究，并与中国的实际问题相结合”。^①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对于战后货币秩序的诉求，而职能官员与专业人士的广泛讨论及互动是共识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

经济学家及银行家主要关注中国作为弱国的发展利益。有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称号的刘大钧提出多份备忘录，强调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权力。他认为美英计划关于份额的计算都不符合中国利益。鉴于中国国际收支将出现严重失衡局面，在确定份额时，中国必须提出不同的公式，务必考虑中国的潜在经济力量。战后规划应考虑中国的紧急需求。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祖诒认为中国应该就战后计划提出明确观点，即战后救济和重建必须与货币稳定工作同时推进，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必须得到考虑。^②贝祖诒的呼吁成为促成中国提出本国方案的重要因素。经此，社会舆论的主张被传递至决策层面。

首先提出具体方案的是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梁庆椿。1943年5月11日，他和财政部次长顾翊群拿出了名为“国际复兴金融公司”的方案。该公司致力于世界永久和平与繁荣，将从事战后救济、扩大生产、稳定货币等工作。会员国份额的确定基于国家银行的财政状况等。^③看得出来，梁庆椿和顾翊群特别注意弱化黄金的作用，在管理上追求各国平等，并照顾经济落后国家的利益，与社会各界的呼吁保持了一致。

1943年4月28日，财政部首次召集跨部门职能官员与金融专家讨论战后国际货币计划问题，社会大讨论的成果反映在了会议上。银

① To John Parke Young, April 7, 1943, Box 78, Arthur N. Young Papers, Hoover Archives, CA, USA.

② Memorandum of Dr. D.K. Lieu, Memorandum on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Currency Plans, May 2, 1943; Memorandum by Mr. Pei Tsuyee, April 27, 1943, Box 78, Arthur N. Young Papers, Hoover Archives, CA, USA.

③ Memorandum of Dr. Y.C. Koo re proposed International Reconstruction Financial Corporation, May 1943, Box 78, Arthur N. Young Papers, Hoover Archives, CA, USA.

行家张嘉璈称，美方注重货币汇率，英方注重贸易，而中国对于外汇基金及贸易差额，均需外助，故应加入。会议反复强调“中国应取得更大的份额，设立过渡时期推动国内经济复兴与调整”的重要性，“惟中国尚缺乏过渡时代之复员资金，及初步开发资金，亟宜提出一混合英美两案之方案，加以长期资金之安排。至将来该项机关之管理与运用，必须为国际的，而非由美英两国垄断的。中国更须提出税则问题，使之同时解决。”^① 总之，货币问题与经济问题无法分离。金融顾问杨格同样认为，中国更为迫切的需求是战后初期的金融与经济复兴，它们对于中国参加任何战后货币组织都是必要的准备。这一观点与中国专业群体的看法并无不同。此后，财政部又召开了若干次讨论会，参与的有俞鸿钧、顾翊群、陈行、贝祖诒、刘攻芸、郭锦坤、冀朝鼎、陈光甫等人，他们要么是职能官员，要么是经济专家或银行界人士。到 6 月初，经四易其稿，代表弱国得益，强调经济发展权的中国方案出炉，这是盟国所提唯一代表经济落后国家得益的方案。中国将它作为同美英讨论的基础。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对此专门发表社论，认为“与美英就货币计划交换意见，是很可注意的一件事”，提出为了战后和平与经济发展，中国应在货币问题上与盟国保持密切合作，以利于战后中国发展。^②

由此可见，中国方案实质上是一项源出于中国社会的内生方案，代表了全民族的意志。在专业群体广泛参与的情况下，中国参与谈判是受到本国需求的驱动，主动对美交涉，而非仅是被动对西方方案做出反应。提出战后国际货币计划是战时中国主动参与战后国际秩序构建，实现大国地位与复兴之梦的首要一步。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专业群体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四、社会各界助力中国参与谈判

中国参与布雷顿森林谈判，基本以中国方案为基础，围绕中国大国地位、过渡时期、货币平价、资本流动、币制贷款等问题展开交涉，最终基本得到落实。对此，社会各界给予热情支持。舆论多认为，会

① 姚崧岭：《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23 页。

② 《关于货币稳定》，《新华日报》，1943 年 6 月 19 日，第 2 版。

议超出了对于货币事务的影响，对世界和平与繁荣多有助益。著名经济学家、中国计量经济学开拓者厉德寅清醒地看到，中国应利用谈判加快经济建设，增加维持世界和平及繁荣的力量。经济学家赵兰坪称，“国际货币会议已告成功……对于战后各国之经济复兴，亦能发生相当作用……今后世界和平，实利赖焉”。^①中共也充分肯定了中国大国地位在国际经济领域的确定。自1943年国际货币谈判公开以来，中共主要通过报刊参与社会讨论，辅以个别党员直接参与谈判的方式对谈判产生影响。与国民党盲目将希望放在外援上不同，中共支持国际合作，认为中国欲建成真正的世界大国，外援固然重要，但自力更生方为根本。这一看法影响到中国对于布雷顿森林谈判的参与。^②

中国社会各界重视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收获，认为中国自谈判所得，特别是国际货币合作与国际长期投资，对于中国战后稳定币值和利用外资有极大助力。因为事关民族复兴大业，中国上下对于工业化非常重视，按照1943年的估计，五年工业计划，中国约需资本15亿美元，甚至有人估计需要40亿美元。^③无论如何，战后工业建设计划非常庞大，要付诸实行，“必然有大量机器及工业物资进口，且需要筹措大量工业资金，故在战后若干年中，贸易逆差及入超趋势，必然更甚，长时间的失衡，可能性至大，这有赖于世界银行国际长期投资政策的运用以资调剂”，进而维持国际收支的均衡，其意义不言而喻。^④对于币值稳定问题，学者们主张，应顾及当时法币对美元、英镑、卢布的购买力平价，还应设法增加黄金的生产量。^⑤彭定基强调，须兼顾法币的国内外价值。对外价值，有赖国际合作；对内价值，依赖本国财政收支的平衡。“必须举国上下，以最大之努力，策求国家预算之平衡，国内物价水准之安定，甚且进而促国际收支之均衡，然后其对内价值，始能趋于一定。”^⑥

在布雷顿森林谈判中，中国积极争取大国地位，做不发达国家的

① 赵兰坪：《国际货币问题之回顾与前瞻》，《经济汇报》，1944年第5—6期，第10页。

② 张士伟：《中国共产党对布雷顿森林谈判的观察、参与及其影响》，《史林》，2023年第4期。

③ 何品、宣刚：《陈光甫日记言论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年版，第203页。

④ 曾纪桐：《怀特战后货币计划与国际银行计划》，《东方杂志》，1944年第4期，第20页。

⑤ 吴纪先：《写在“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闭幕以后（三）（美国特约航空通信）》，《华声》，1944年第4期，第23页。

⑥ 彭定基：《从国际货币基金宣言展视今后基金之运用》，《裕民（遂川）》，1946年第8期，第44页。

领袖，主动向世界展现出一个热情、合作及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家形象。这同样受到社会各界的影响。专业人士为中国参与谈判提供了大量的理论献言，推动当时参与谈判的人员思考中国的国际身份，尝试在战后秩序中承担与美英不同的国际责任。如经济学家王振寰所言，“中国既为战后主要国家之一，对于战后世界任何主要问题，吾人惟有负起主势的推动责任”。^①余其同称，“力量薄弱之国家，应有相当权力可以保障其劣势之地位”，^②明确了弱国有重建与发展的权利。实际上，协助各国经济发展，并非仅仅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论述经济落后国家的主张。伍启元称，“美英所应有者为领导权而非独裁权……须满足各国之要求以资本供给彼等，即对资本薄弱之国家投资，帮助此类国家完成工业化之大业，权利与义务不可分。”^③对于发达国家责任的强调与一些国家的看法不谋而合，如比利时就认为大国责任重于权利，接受《大西洋宪章》的国家必须依照此次战争理想而行，方能负此项责任。中国在为弱国说话的同时，也强调了大国的责任，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

中国参加布雷顿森林谈判并取得成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这与中国社会的广泛参与密切相关。正是在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下，中国提出唯一代表弱国利益的方案，在全社会的关注和监督下，中国代表团成功将方案的核心内容注入《布雷顿森林协定》，在美国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之中加入贸易统制内容，不仅奠定了中国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基础，还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美国对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的忽视，使布雷顿森林两大机构从一开始就关注弱国的重建与发展问题。毫无疑问，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百余年前，孙中山提出“济弱扶倾”的理念，强调发达国家助力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并畅想未来中国强大了，同样会扶持弱小民族。此后在联合国的筹建过程中，中国将自己视为世界弱小民族的代表，频频为小国争取利益。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崛起，更意味着中国同各国共享繁荣和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共同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① 王振寰：《战后国际货币问题与中国》，《大路（泰和）》，1943年第5/6期，第42页。

② 余其同：《国际货币合作之前途与我国立场》，《财政评论》，1943年第1期，第15页。

③ 伍启元：《战后世界货币稳定计划之分析》，1943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761-00249。

“五大家园”建设：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设想与实践

岳 山

202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这场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始终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积极推动国际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工作，提出了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倡导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2025 年，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召开，进一步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周边工作的目标任务和思路举措，强调要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以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共同愿景，努力开创周边工作新局面。这一战略部署，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周边地区和平与发展的责任担当，更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一）“五大家园”建设的时代背景与重要意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年来，世界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然而，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一员，与周边众多发展中国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相似的发展诉求。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不仅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

“五大家园”建设对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国际层面看，它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通过建设和平家园，倡导对话协商解决争端，能够有效避免地区冲突的升级，为世界和平提供坚实保障；通过建设安宁家园，加强安全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够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进而促进全球的安宁。

从地区层面看，“五大家园”建设能够促进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与繁荣。建设繁荣家园，通过加强经济合作，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建设美丽家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

从国家层面看，“五大家园”建设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为中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通过建设友好家园，加强人文交流，增进民间友好往来，能够加深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巩固传统友谊，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

（二）“五大家园”建设的内涵解析

中国积极推动“五大家园”建设，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五大家园”建设涵盖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生态等多个领域，体现了中国对周边外交的全面布局 and 战略思考。通过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打造一个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周边环境。

和平家园：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基石。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建设和平家园是“五大家园”建设的首要目标。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一安全观与传统的安全观不同，传统安全观主要关注军事安全，而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强调安全的综合性，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安全，体现了相互依存的安全理念。在实践中，中国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对话与协商，通过建立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妥善处理领土争端和安全分歧。例如，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同时，积极推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全面有效落实，

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致力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从国际法角度来看，中国依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南海争端，体现了中国对国际法的尊重和维护。

安宁家园：实现长治久安的保障。安宁家园强调地区的长治久安，不仅包括传统安全领域的稳定，还涉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有效治理。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提出的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建设安宁家园提供了创新思路，体现了亚洲地区独特的价值观，强调和谐、包容、合作，与西方传统的安全模式有所不同。在非传统安全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加强在反恐、禁毒、打击跨国犯罪、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在传统安全领域，中国通过加强军事交流与互信，开展联合军事演习等方式，增进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有效管控地区热点问题，维护地区安宁，这符合建立信任措施理论，通过军事交流等方式增进相互信任，降低冲突风险。

繁荣家园：携手共进现代化之路。繁荣家园旨在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与繁荣。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以自身发展带动周边国家发展。从发展经济学理论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模式为周边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中国通过产业转移、技术输出等方式，帮助周边国家提升经济发展水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建设繁荣家园的主要平台，通过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产业合作等举措，为周边国家提供发展机遇。中国与周边国家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全面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共同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努力让亚洲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发展高地，这符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关于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提升区域竞争力的观点。

美丽家园：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美丽家园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动绿色发展是建设美丽家园的核心。中国秉持绿色发展理念，积极与周边国家开展生态环境合作。从环境伦理学理论角度来看，绿色发展理念体现了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落实《巴黎协定》，加强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碳减排等领域的合作。从全球环境治理理论角度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体现了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积极承担责任，与周边国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在生态保护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跨境生态保护、水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开展合作。

友好家园：编织民心相通的纽带。友好家园强调加强人文交流与民间往来，增进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民心相通是“五大家园”建设的社会根基，通过广泛的人文交流，可以消除误解、增进互信。从社会心理学理论角度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可以减少偏见和误解，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 and 好感。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中国与周边国家还加强了媒体合作、青年交流等，为友好家园建设营造良好氛围，不断筑牢相知相亲、世代友好的基石。

（三）“五大家园”建设的实践路径

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中国秉持习近平外交思想，积极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的共同愿景，是对习近平外交思想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化与实践，对坚定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

一是以元首外交为引领，巩固战略互信。元首外交在“五大家园”建设中发挥着引领和统合作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周边外交，亲自开展元首外交，与周边国家领导人保持密切沟通与互动，为双边和多边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从外交决策理论角度来看，元首外交能够从战略高度对国家间关系进行规划和指导，具有权威性和战略性。元首外交能够就重大问题达成战略共识，巩固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例如，2025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的国事访问，推动了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就共建命运共同体、深化各领域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积极发挥元首外交的引领作用，加强高层交往，定期举行双边和多边领导人会晤，能够及时沟通协调，妥善解决分歧，不断提升战略互信水平。

二是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平台，深化发展融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五大家园”建设的主要平台和重要抓手。要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能源资源、科技创

新等领域的合作。从国际经济合作理论角度来看,共建“一带一路”通过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降低了贸易成本,促进了要素的自由流动,符合国际经济合作中关于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促进共同发展的要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持续推进中欧班列、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项目建设与运营,完善地区互联互通网络。在贸易投资领域,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降低贸易壁垒,扩大市场准入,加强双向投资合作。在能源资源合作方面,加强与周边国家在能源勘探开发、运输通道建设、能源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合作,保障能源安全。同时,注重科技创新合作,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

三是以亚洲安全模式为支撑,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五大家园”建设提供了战略支撑。要加强与周边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建立健全多层次、多领域的安全合作机制。从安全合作理论角度来看,建立安全合作机制可以增强国家间的互信,降低安全困境,有效维护地区安全。在传统安全方面,加强军事交流与互信,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海上联合巡逻等活动,共同应对外部军事威胁。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加强在反恐、禁毒、网络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应急救援等机制。同时,积极推动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劝和促谈,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四是以人文交流为纽带,扩大交往交流。人文交流是“五大家园”建设的重要纽带和基础,要进一步拓展与周边国家在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从文化外交理论角度来看,人文交流作为文化外交的重要形式,能够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增进人民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在教育领域,增加留学生交流规模,开展联合科研项目和学术交流活动,加强职业教育合作,培养高素质人才。在文化领域,举办文化年、艺术展览、影视交流等活动,展示各国优秀文化成果,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在旅游领域,加强旅游合作,开发跨境旅游线路,简化签证手续,促进人员往来。

五是以体制机制建设为保障,加强协调配合。体制机制建设是“五大家园”建设的重要保障。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周边工作协调机制,形成各部门协同配合、地方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从公共管理理论角度来看,加强统一领导和协调机制建设,可以提高工作

效率，避免部门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深化涉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为周边外交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熟悉周边国家国情、精通外交业务、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同时，加强对周边国家的研究，深入了解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情况，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外交政策提供依据。此外，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合作机制建设，如加强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合作机制的建设与发展，提升中国在区域合作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四）“五大家园”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五大家园”的建成是一项艰辛而浩大的工程，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地缘政治冲突与大国博弈。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热点问题，如朝鲜半岛局势、印巴争端等，这些问题背后往往涉及大国的利益博弈，增加了地区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些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在地区的影响力，采取遏制中国发展的策略，在周边地区制造麻烦，干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例如，美国在南海问题上频繁挑衅，支持其盟友在南海的非法活动，试图破坏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合作进程。

二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合作障碍。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部分国家基础设施薄弱、市场机制不完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严重，这给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带来了一定的障碍。一些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时，由于自身能力有限，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资金短缺、技术不足、管理不善等问题，影响合作的顺利推进。此外，全球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如贸易摩擦、金融市场波动等，也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产生了负面影响。

三是安全威胁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周边地区面临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除了领土争端、军事对峙等传统安全问题外，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跨国犯罪、网络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加剧。这些安全威胁具有跨国性、突发性和联动性的特点，给地区安全合作带来了巨大挑战。例如，“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在中亚、南亚地区的渗透和活动，对地区的安全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网络攻击事件频发，给各国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了潜在风险。

四是文化差异与民意误解。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导致在人文交流过程中出现误解和冲突。一些西方势力利用文化差异，在周边国家进行舆论抹黑和文化渗透，误导当地民众对中国的认知，破坏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例如，一些西方国家在涉疆、涉藏问题上编造谎言，恶意攻击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试图在周边国家制造对中国的负面舆论氛围。

在实践中，尽管面临地缘政治冲突、经济发展不平衡、安全威胁复杂多样以及文化差异等诸多挑战，但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外交政策，积极采取应对策略，努力化解矛盾，推动合作。通过高层引领、战略沟通、经贸合作、安全合作、人文交流、生态合作等多方面的实践路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深化，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为“五大家园”建设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是坚持和平外交。中国应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外交途径积极斡旋调解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应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各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同时，加强与大国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倡导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避免大国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冲突，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中国可以通过举办多边对话会议、开展穿梭外交等方式，为解决地缘政治冲突搭建平台，促进各方相互理解和信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二是推动包容性发展，完善合作机制。中国应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包容性发展，关注周边国家的发展需求和利益关切，通过提供技术援助、资金支持、能力建设等方式，帮助周边国家提升自身发展能力，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政策沟通和项目对接，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合作方案，确保合作项目的可持续性和互利共赢性。同时，完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加强规则制定和协调，减少贸易投资壁垒，提高区域经济合作的效率和质量。例如，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深入实施，加强中国与东盟、日韩等国家的经济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三是构建综合安全体系，提升应对能力。加强与周边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构建综合安全体系。在传统安全方面，加强军事

互信和交流，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提高共同应对军事威胁的能力。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建立健全跨境安全合作机制，加强情报共享、联合执法、应急救援等方面的合作。例如，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反恐情报交流和联合行动，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和人员流动渠道；在网络安全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制定网络安全规则和标准，加强网络安全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提升各国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同时，建立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合作机制，加强疫情监测、信息共享和联合防控，提高地区公共卫生安全保障水平。通过构建综合安全体系，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应对各类安全威胁的能力，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

四是加强文化交流与舆论引导。深入开展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增进相互了解和文化认同。通过举办文化展览、艺术演出、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展示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成果，同时积极学习借鉴周边国家的文化精华，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加强对周边国家的舆论宣传工作，利用新媒体平台、国际传播机构等渠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回应国际关切，及时澄清不实言论，消除误解和偏见。此外，还要加强与周边国家媒体的合作，建立常态化的媒体交流机制，共同传播正能量，促进地区的和谐发展。

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秉持习近平外交思想，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周边事务，不断丰富“五大家园”建设的内涵和实践，为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力量。同时，中国也期待与周边国家携手共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开创亚洲和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让和平与发展的阳光普照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责任编辑：王国平、李丽]